



分卷主编  
主编 王必胜  
潘凯雄 蒙



# 中国 散文 最佳 2014





—

2014

# 中国最佳散文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王必胜 潘凯雄

© 王必胜 潘凯雄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4 中国最佳散文 / 王必胜, 潘凯雄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 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8142-3

I. ①2… II. ①王… ②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651 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67 千字

出版时间: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丁末末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李 霞

书 号: ISBN 978-7-205-08142-3

---

定 价: 31.00 元

#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 篇 小 说 卷 林建法

短 篇 小 说 卷 林建法

# 序

## “鲁奖”之后说散文

王必胜

这在今年可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不久前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吐槽之声不绝于耳，较之往届，更是严重。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都有质疑，弄得主办方没了脾气，孰是孰非，没了下文，也很没面子。有些批评头头是道，除了网上外，公开见报的不在少数。像《文学报》“新批评”上的文章，对诗歌、报告文学中的几部作品，从文本内容到写作方式，基本上是否定。现如今，读者公众是苛刻的，信息时代资讯发达，意见可随时随意表达，手指点击之间，或可能引起海量的围观，任何失当和瑕疵都可能被纠缠，也不会因为官办或有关方面的噤声而停止热议。一时间，对于文学评奖如何看待，如何寻找客观评价标准，如何完善评奖机制，回归文学本身等，坊间口碑，手机网上，议论纷纷，当然还有那些评奖背后的种种怪象，也时有所闻。

有人说，这是好现象，一人谔谔比众人诺诺好，说明文学的民主进程精进前行，说明文学本身没有远离大众，任何讨论都会促进工作的改进。我却不以为然。为什么总是在一些常识上屡屡为人诟病？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文学，而受迷弄的也是那些真诚而执着的文学读者呢？

“鲁奖”的散文类评奖，是评作品集，获奖的多是文集，或专题散文（当然还有散文、杂文与随笔一锅煮，为同一奖项，也待商榷的）。好像前几届也如此。给人的印象是，注重集子和长篇单本，以为数量上或是体量上的厚实，才可能有文学的分量。所以，评出的作品只是散文集，无形中就把这个标准定在长而厚的规模上，评奖只评作品集，这样一来，单篇作品，包括所谓的大散文、文化散文类长文，没有了资格。这里，把散文的范围定格在作品集上，而短制、精小，作为散文文体的主要特色，就可能被模糊掉了。好像报告文学也是如此。那些精湛深邃之作，并不一定是一部长篇的结构，并不一定是一部专著的规模。而另一种文学品种小说，却分为中篇和短篇参评，其标准只是以字数篇幅的多少来定。短篇小说，也不过三五万字的篇幅，同一些单篇散文、报告文学，在字数上差不多。这样，从文体要求上，

评奖的标准就畸轻畸重，忽视了还有长为数万字的单篇散文或报告文学。这对单篇作品是不公平的，特别是散文，对其特色无疑是损伤，放任散文的长篇大论，为那些近乎于纪实报告、说理式的杂谈，或者小说般的虚构类的文字开了绿灯。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有些作品中，过于写实的回忆，过分渲染甚至于编造的痕迹，芜杂而不乏自炫的叙述，丧失了散文真实性、精致化的原则。这不能不是，好大喜长，没有严格的文体要求所导致的弊端。

其实，散文是以短小精制为其特色的，现代散文自文体分工细化以后，因其体量小，制作精细，意境灵动，为读者喜爱，为研究者关注。近代以来，文学有了明细的分类，散文的角色是短小精制，注重意境，情怀盎然。或者说，她是以小见长，见微知著，是短制，多性灵之作。我们看到，众多大家作品，书写人生感悟、世道人心，阐发生活情怀、现实感受，多是一些精制之作，在题材上自由不拘，花鸟虫鱼，风花雪月，贩夫走卒，五行八作，都可成为经典之作。鲁迅的名篇《朝花夕拾》《野草》《一件小事》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周作人、孙犁等人的名篇，也多是千字文，其内涵和分量也为人们所共识。散文的见微知著，散文的以一当十，散文的四两拨千斤，恰是她的特色。如此一来，散文就不能光是以那些尾大不掉高头讲章似文字来表明她的质量和成效。我以为，散文在有些人的误区中，是过分地强调了其题材优势的，好像以题材的大小轻重先入为主成为评判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一些散文多是历史的回忆、革命的主题、民生的诉求、个人的家谱和家族账单等，让她有很多的负重，而成为纪实文学或者报告文学类界限模糊的一种文体。文体分类精细化，散文不是笼统的广义概念。可是，散文在有些场合被当成一种没有边界的文体。前几年的大散文、文化散文之说，丰富了散文的多样性，只是，过于沉重的理性情感，过分信马由缰似的随意书写，多为人诟病，没有太多的市场，也容易流于题旨上的“高大上”似的写作路数。影响所及，有些作者顽固地走着这种路子，但是，看重大题材注重历史文化，也要对短小精粹的作品，对书写生活事件中的现实情味、新鲜人事的作品，予以同样的关注。散文的出身是接近地气与呼吸民生的一种轻快的文字，如果说，史传诗赋随笔是精英文字，那么散文是民间化的普罗情结，以其闲雅清淡的风格，而获得文学身份认证的。

当于此，我以为，散文现在变得面目庄重，情感粗疏，缺少可爱而温情，一些散文家总爱标举思想旗帜，打造史诗力度，宏大的视角，而少有现代散文名篇的真性情和烟火气味，情怀、性情、气味，这样一些唯散文而独有的，却稀少仅见了。十年前，曾为散文的减负，掉书袋的迂执，写过文章呼吁，题目是《让散文卸下包袱》，而今，我仍然以为，是散文的严肃面

孔，是过分负载的思想要求和史诗担当，使她变得不太亲和，不太民间，也不太灵动，如此，她与随笔、杂文以至纪实类的报告特写等文体多有相近，也常相混淆，这样的不伦不类的现状，造成了有些评奖也多遭非议，其标准难以客观到位。

因此，为年度的散文选计，固然不能忽略那些表现了一个时期社会人生现状的作品，但时下现实生活中有困境与突围，有欢笑也有眼泪，有幸也有苦厄，有收获也有焦虑，文学也要多方面的予以关注。不能不说，书写那些细致的人生情怀、个体的精神情感，有灵性和温度的文字，是我们更要看重的，或者更接近于散文本体的要求，可是这在如今散文的海洋中已为鲜见，在一些杂志报章中这类作品也不多，只是像《北京文学》和天津的《散文》上，才读到以上的文字。于是，我们既要风云叱咤的磅礴之作，也要风月清丽的性情文字，这样的文学阵势才是完整的，这样的散文面貌才是真实的。当下的散文后者是缺少的。囿于客观条件和编选者的眼光，力所不逮，是也非也，只好请读者鉴谅了。

# 目 录

序 “鲁奖”之后说散文 ..... 王必胜

梁 衡	带伤的重阳木	1
铁 凝	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	6
张曼菱	北大回忆	13
袁 鹰	冰心老人风范	24
黄济人	未了情	34
王 蒙	数学为什么可爱	37
余秋雨	祭笔	43
韩少功	关于革命	53
郭文斌	认识我们的心	58
陈佐洱	猫亲咪咪	67
南 帆	到来一只狗	77
塞 壬	耻	89
格 致	外科医生的手	101
周 涛	初雪·冬日阳光	108
张 炜	描花的日子	115
朱增泉	土门	133
丹 增	有德者居之	138
周晓枫	独唱	148
筱 敏	告别老家	163
王巨才	浪打沙湾寂寞回	170
彭学明	这样回到母亲河	175
赵丽宏	日晷之影	191
乔 叶	在呼伦贝尔的郊外	198
石一宁	上林忆想	205
马小淘	骗你的	211

散文

叶延滨	不带手机的约会	216
刘齐	富豪的晚宴	219
黑马	时光书	226
吴佳骏	穴居里的黑暗和光明	231
刘亮程	驴知道世界上的路	240
龙一	春花崇礼	250

# 带伤的重阳木

梁 衡

毛泽东有一首词，里面有一句：“岁岁重阳，今又重阳。”2013年重阳节刚过，我就到湖南湘潭来看一棵树，树名重阳木。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是当地人的俗称。后来一查才知道这就是它的学名。大戟科，重阳木属。产长江以南，根深树大，冠如伞盖，木质坚硬，抗风、抗污能力极强，常被乡民膜拜为树神。能以它为标志命名为一个属种，可见这是一种很正规、很典型的树。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也是彭德怀的家乡，我曾去过多此，而这次却是专门为了这棵树，为了这棵重阳木。

这棵重阳木长在湘潭县黄荆坪村外的一条河旁，河名流叶河，从上游的隐山流下来的。隐山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南宋时胡安国在这里创办“碧泉书院”，后逐渐发展成一个著名学派，出了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等不少名人。现隐山范围内还有左宗棠故居、周敦颐的濂溪书堂等文化景点。这条河从山里流出，进入平原的人烟稠密地带后，就五里一渡，八里一桥，碧浪轻轻，水波映人。而每座桥旁都会有一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供人歇脚纳凉。我要找的这棵重阳木就在流叶桥旁，当地人叫它“元帅树”，和彭德怀元帅的一段逸事有关。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午后，太阳西斜，远山在天边显出一个起伏的轮廓，深秋的田野上裸露着刚收割过的稻茬，垅间的秋菜在阳光下探出嫩绿的新叶。河边有农家新盖的屋舍，远处有冉冉的炊烟，四野茫茫，寥廓江天，目光所及，唯有这棵大树，十分高大，却又有一丝的孤独。这树出地之后，在两米多高处分成两股粗壮的主干，不即不离并行着一直向天空伸去，枝叶遮住了路边的半座楼房。由于岁月的侵蚀，树皮高低不平，树纹左右扭曲，如山川起伏，河流经地。我们想量一下它的周长，三个人走上前去伸开双臂，还是不能合拢。它伟岸的身躯有一种无可撼动的气势，而柔枝绿叶又披拂着，轻轻地垂下来，像是要亲吻大地。虽是深秋，树叶仍十分茂密，在斜阳中泛着粼粼的光。55年前，一个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棵树下。

1958年，那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特殊年份，也是彭德怀心里最纠结不解的

一年。还是在上年底，彭就发现报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大跃进”。他不以为然，说跃进是质变，就算产量增加也不能叫跃进呀。转过年，1958年的2月18日，彭为《解放军报》写祝贺春节的稿子，就把秘书拟的“大跃进”全改成了“大发展”。而事有凑巧，同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修改过的社论却在讲“促进生产大跃进”。也许从这时起，彭的头脑里就埋下了一粒疑问的种子。3月，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接着中央在成都开会，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意气风发、势如破竹。彭也被鼓舞得热血沸腾。5月，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并要求各项工作大跃进，钢产量比上年要翻一番，彭也举手同意。会后的第二天他即到东北视察，很为沿途的跃进气氛所感动。他向部队讲话说：“过去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饿肚子，今年解决了。今年钢产量1070万吨，明年2500万吨，‘一天等于20年’，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10月，他到甘肃视察，看到盲目搞大公社致使农民杀羊、杀驴，生产资料遭破坏，公社食堂大量浪费粮食，社员却吃不饱，又心生疑虑。回到北京，部队里有人要求成立公社，要求实行供给制。他说：“这不行，部队是战斗组织，怎么能搞公社？不要把过去的军事共产主义和未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12月，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说当年粮食产量已超万亿斤，彭说怕没有这么多吧，被人批评保守。他就这样在痛苦与疑惑中度过了1958年。

武汉会议一结束，彭没有回京，便到湖南做调查，他想家乡人总是能给他说些真话。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调查，他介绍说全省建起5万个土高炉，能生火的不到一半，能出铁的更少。而为了炼铁，群众家里的铁锅都被收缴，大量砍伐树木，甚至拆房子、卸门窗。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住在彭家围子自己的旧房子里。当天晚上乡亲们挤满了一屋子，七嘴八舌说社情。他最关心粮食产量的真假，听说有个生产队亩产过千斤，他立即同干部打着手电步行数里到田边察看。他蹲下身子拔起一蔸稻子，仔细数秆、数粒。他说：“你们看，禾蔸这么小，秆子这么瘦，能上千斤？我小时种田，一亩500斤，就是好禾呢。”他听说公社铁厂炼出640吨铁，就去看现场，算细账，说为了这一点铁，动用了公社的劳力，稻谷烂在地里，还砍伐了山林，这不合算。他去看公社办的学校，这里也在搞军事化，从一年级开始就全部住校。寒冬季节，门窗没有玻璃，狮子大张口，冷风飕飕直往屋里灌。孩子们住上下层的大通铺，睡稻草，尿床，满屋臭气。食堂吃不饱，学生们面有菜色。他说：“小学生军事化，化不得呀！没有妈妈照顾要生病的。快开笼放雀，都让他们回去吧。”当天学生们就都回了家，高兴得如遇大赦。彭总这

次回乡住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看了农田、铁厂、学校、食堂、敬老院。他用筷子挑挑食堂的菜，没有油水。摸摸老人的床，没有褥子，眉头皱成了一团。他说：“这怎么行，共产主义狂热症，不顾群众的死活。”那天，他从黄荆坪出来看见一群人正围着一棵大树，正熙熙攘攘，原来又是在砍树。他走上前说：“这么好的树，长成这个样子不容易啊。你们舍得砍掉它？让它留下来在这桥边给过路人遮点阴凉不好吗？”这时大树的齐根处已被斧子砍进一道深沟，青色的树皮向外翻卷，木质部已被剥出一个深窝，雪白的木渣飞满一地。而在桥的另一头，一棵大槐树已被放倒。他心里一阵难受，像是在战场上，看到了流血倒地的士兵，紧绷着嘴一句话也不说，便默默地上了车，接着前去韶山考察人民公社。周小舟见状连忙吩咐干部停止砍树。这天是1958年12月17日。

这个彭老总护树的故事，我大约三年前就已听说，一直存在心里，这次才有缘到现场一看。这棵重阳木紧贴着石桥，桥边有一座房子，房主老人姓欧阳，当年他正在现场，讲述往事如在眼前。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给老百姓留一点阴凉！我问那棵阻拦不及而被砍掉的古槐在什么位置，老人顺手往桥那边一指，桥外是路，路外是收割后的水田，一片空茫。我就去凭吊那座古桥，这是一座不知修于何年何月的老石桥，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旁边早已另辟新路，它也被弃而不用，但石板仍还完好，桥正中留有一条独轮车辗出的深槽。石板经过无数脚步、车轮还有岁月的打磨，光滑得像一面镜子，在夕阳中静静地沉思着。车辙里、栏杆底下簇拥着刚飘落的秋叶，这桥仍在不停地收藏着新的记忆。

我蹲下身去，仔细察看树上当年留下的斧痕。这是一个方圆深浅近一尺的树洞，可知那天彭总喝退刀斧时，这可怜的老树已被砍得有多深。我们知道，树木是通过表皮来输送营养和水分的，55年过去了，可以清晰地看到，树皮小心地裹护着树心，相濡以沫，一点一点地涂盖着木质上的斧痕，经年累月，这个洞在一圈一圈地缩小。现在虽已看不到裸露的伤口，但还是留下了一个凹陷着的碗口大的疤痕。疤痕呈一个圆窝形，这令我想起在气象预告图上常见的海上风暴旋动的窝槽，又像是一个旧社会穷人卖身时被强按的红手印，似有风声、哭喊、雷鸣回旋其中。55年的岁月也未能抚平它的伤痛。就像一只受伤的老虎，躲在山崖下独自舔着自己的伤口，这棵重阳木偎在石桥旁，靠树皮组织分泌的汁液，一滴一滴地填补着这个深可及骨的伤洞。我用手轻轻抚摸着洞口一圈圈干硬的树皮，摸着这些枯涩的皱褶，侧耳静听着历史的回声。

彭德怀湘潭调查之后，又回京忙他的军务。但“大跃进”的狂热，遍地

# 散文

4

冒烟的土高炉，田野里无人收割的稻谷、棉花，公社大食堂没有油水的饭菜，一幕一幕，在他的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转过年，就是1959年，彭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人生的转折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转折之年。其时“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经济困境已逐渐显露出来，这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准备纠“左”，彭根据他的调查据实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但毛泽东是不允许别人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于是就将彭并支持彭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起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从此，在党内高层就很难听到不同意见了，直到发生“文革”大难。彭德怀生性刚正不阿，又极认真。他罢官后被安置在北京郊外一处荒废的院子里，就自己开荒、积肥、种地，要验证那些亩产千斤、万斤的神话。1961年12月他再次向毛泽东写信申请回乡调查。这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季，他回乡住了56天。经过1958年的大砍伐，家乡举目四望，已几乎看不到一棵树。他对陪同人员说：“你看山是光秃秃的，和尚脑壳没有毛。我二十三四岁时避难回家种田，推脚子车（独轮车）沿湘河到湘潭，一路树荫，都不用戴草帽。再长成以前那样的山林，恐怕要50年、80年也不成。现在农民盖房想找根木料都难。”他一共写了5个调查报告，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在黄荆坪集市调查木料的价格。回京后他给家乡寄来四大箱子树种，嘱咐要想尽法子多种树。他念念不忘栽树、护树，是因为这树连着百姓的命根子啊。他虽是戎马一生，在炮火硝烟中滚爬，却是爱绿如命。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总部设在山西武乡。山里人穷，春天以榆钱（榆树花）为食。彭就在总部门口栽了一棵榆树，现在已有参天之高，老乡呼之为“彭总榆”，成了永久的纪念。1949年，他率大军进军西北，驻于陕西白水县之仓颉庙外。庙中有“二龙戏珠”古柏一株。炊事班做饭无柴就爬上树将那颗“珠子”割下来烧了火。彭严肃批评并当即亲笔书写命令一道：“全体指战员均须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严格禁止攀折树木，不得随意破坏。”现这命令还刻在树下的石头上。彭总不忘百姓，百姓也不忘彭总。他的冤案昭雪之后，这棵重阳木就被当地群众称为“元帅树”，年年祭奠，四时养护。我在树旁看到有农民刚砌好的一口井，上面也刻了“元帅井”三个字。而树下还有一块石碑，辨认字迹，是1998年有一个企业来领养这棵树，国家林业局还为此正式发了文，并做了档案记录。那年的树龄是490年，树高22米，胸径1.2米。又15年过去了，这树已过500大寿，更加高大壮实。彭总又回到了湘潭大地，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

因为当年回乡调查是周小舟陪同，他在庐山上又支持彭的意见，也被罚同罪，归入反党。周也是湘潭人，他的故居离这棵重阳木只有二里地，我顺便又去拜谒。这是一座白墙黑瓦的小院，典型的湘中民居。周在这里度过了

童年，后来来到北方学习，参加革命，领导“一二·九”运动，极有才华。因为到延安汇报工作，被毛泽东看中，便留下当了一年的秘书。后又南下，直到任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本是十分欣赏他的，1956年曾对他说：“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可惜他和彭德怀一样，也是为民请命不顾命的人。庐山会议后，他一下子从省委书记被贬为一个公社副书记。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保护百姓。在那个非常时期他的公社是最少饿肚子的。

看过这棵重阳木的当晚，我夜宿韶山，窗外就是毛泽东塑像广场，月光如水，“共产党最好，毛主席最亲”的老歌旋律在夜空中轻轻飘荡。我清理着白天的笔记和照片，很为毛泽东未能听取彭、周的逆耳忠言而遗憾。周曾是他的秘书，而彭从长征到抗美援朝，也是他很倚重的人，毛泽东曾有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终因政见不合，自折手足。谁能想到三个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忠诚共事的同志、不出百里的老乡，在庐山上面对自己家乡的同一堆调查材料，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真是一场悲剧。而直到1965年，毛泽东才重新起用彭，并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但这一点友谊和真理的回光又很快被第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所吞灭。现在毛泽东、彭德怀、周小舟三人都早已作古。“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人们年复一年地讲述着重阳木的故事，三个战友和老乡却再也不能重聚。这棵重阳木却不管寒往暑来，风吹雨打，还在一圈一圈地画着自己的年轮。我想，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大地上如果要寻找58、59那段岁月的活着的记忆，就只有这棵重阳木了，而且这记忆还在与日俱长，并随着尘埃的落定日见清晰，它是一部活着的史书。作为自然生命的树木却能为人类书写人文记录，这真是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它还会超出我们生命的十倍、百倍，继续书写下去。半个多世纪后，当人们再来树下凭吊时，也许那伤口已经平复，但总还会留下一个疤痕。树木无言，无论功过是非，它总是在默默地记录历史。正是：

元帅一怒为古树，喝断斧钺放生路。  
忍看四野青烟起，农夫炼钢田禾枯。  
谏书一封庐山去，烟云缈缈人不复。  
唯留正气在人间，顶天立地重阳木。

（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22日）

# 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

铁 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当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想到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1981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有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窗前一张做工精巧的半圆形硬木小桌，与四周的粗木桌椅比较很是醒目。论气质，显然它是这群家具中的“精英”。贾大山说他的小说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我一面注意这张硬木小桌，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什么出身。贾大山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家好几代都是贫下中农。然后他就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这道汤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大山做汤时程序的严格和那成色的精美。做时，他先将打好的鸡蛋泼入滚开的锅内，再把菠菜撒进锅，待汤稍沸锅即离火。这样菠菜翠绿，蛋花散得地道。至今我还记得他站在炉前打蛋、撒菜时那潇洒、细致的手势。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还告诉我，他的妻儿与这“权威”配合得是如何默契。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绎，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我和贾大山在里屋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贾大山有一个稳定、安宁的家庭，妻子与他同心同德。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但这并不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

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他的外貌也许无法使你相信他有过特别得宠的少年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不仅是历选不败的少先队中队长，他的作文永远是课堂上的范文，而且办墙报、演戏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原来他自幼与戏园子为邻，早就在迷恋京剧中的须生了。有一回贾大山说起京剧忍不住站起来很帅地踢了一下腿，脚尖正好踢到鼻梁上，那便是风华少年时的童子功了。他的文学生涯也要追溯到中学时代在地区报纸上发表小说时。如果不是1958年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寓言诗，很难预料这个多才多艺的男孩子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批判右派的小诗，不料一经出现，全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却一致认为那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寓言。16岁的贾大山蒙了，校长命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小榆树下反省错误，下了一夜雪，他站了一夜。接着便是无尽的检查、自我批判、挖反动根源等，最后学校以警告处分了结此案。贾大山告诉我，从那时起他便懂得了“敌人”这个概念，用他的话说：“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一捏鼓你就成了阶级敌人。”

他辉煌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因病辍学，自卑，孤独，以及为了生计的劳作，在砖瓦厂的石灰窑上当临时工，直到1964年响应号召作为知青去农村。也许他是打算终生做一名地道的正定农民的，但农民却很快发现了他有配合各种运动的“歪才”。于是贾大山在顶着太阳下地的业余时间里演起了“乐观的悲剧”。在大队俱乐部里他的快板能出口成章：“南风吹，麦子黄，贫下中农收割忙……”后来沿着这个“快板阶梯”他竟然不用下地了，他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接着又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这次贾大山被吓着了——使他受到惊吓的是当时的极“左”路线：入党意味着被反复地、一丝不苟地调查，说不定他16岁那点陈年旧账也得被翻腾出来。他的自尊与自卑强烈主宰着他不愿被人去翻腾。那时的贾大山一边做着民办教师，一边用他的编写才华编写着那个时代，还编出了“好处”。他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由知识青年变成县文化馆的干部么？就因为我们县的粮食‘过了江’。”

据当时报载，正定县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过江”的县。为了庆祝粮食“过江”，县里让贾大山创作大型剧本，他写的剧本参加了全省的会演，于是他被县文化馆“挖”了上来。“所以”，贾大山停顿片刻告诉我：“你可不能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好，我在这上边是沾了大光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睛超乎寻常的亮，他那两只狭长的眼睛有时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光亮，那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的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犀利吧。犀利的目光，严肃的神情使你觉得你是在听一个明白人认真地讲着糊涂话。这个讲着糊涂话

# 散文

的明白人说：“干部们就愿意指挥种树，站在你身边一个劲儿叮嘱：‘注意啊注意啊，要根朝下尖朝上，不要尖朝下根朝上啊！’”贾大山的糊涂话讲得庄重透彻而不浮躁，有时你觉得天昏地暗，有时你觉得唯有天昏地暗才是大彻大悟。

1986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这次不是向大山约稿，是应大山之邀。此时他已是县文化局长——这似乎是我早已料到的，他有被重新发现、重新“挖”的苗头。

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千余年来始终是河北重镇之一。曾经，它虽以粮食“过江”而大出过风头，但最为实在的还是它留给当今社会的古代文化。面对城内这“檐牙高啄”“钩心斗角”的古建筑群，这寺院寺庙，做一名文化局长也并非易事。局长不是导游，也不是只把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就能胜任的讲解员，至少你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专家。贾大山自如地做着这专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着使这些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重放光彩的计划，一面接应各路来宾。即使面对再大的学者，专家贾大山也不会露“怯”，因为他的起点不是只了解那些静穆的砖头瓦块，而是佛家、道家各派的学说和枝蔓。这时我作为贾大山的客人观察着他，感觉他在正定这片古文化的群落里生活得越来越稳当妥帖，举止行动如鱼得水。那些古寺古塔仿佛他的心爱之物般被他摩挲着，而谈到他和那些僧人、主持的交往，你在夏日习习的晚风中进一趟临济寺便能一目了然了，那时十有八九他正与寺内主持焦师傅躺在澄灵塔下谈天说地，或听焦师傅演讲禅宗祖师的“棒喝”。

几年后大山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然而他仍旧是个作家，可能还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且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那些故事与他的获奖小说《取经》已有绝大不同。如果说《取经》这篇力作由于受着当时文风的羁绊，或许仍有几分图解政策的痕迹，那么这时贾大山的许多故事你再不会漫不经心地去体味了。虽然他的变化是徐缓的，不动声色的，但他已把目光伸向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于是他的故事便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

贾大山讲给我的故事陆续地变成了小说。比如一位穷了多半辈子终于致富的老汉率领家人进京旅游，当从未坐过火车的他发现慢车票比快车票便宜时居然不可思议地惊叹：“慢车坐的时候长，怎么倒便宜？”比如“社教”运动中，某村在阶级教育展览室抓了一个小偷，原来这小偷是在偷自己的破棉